

■土地与生长

小平数樱桃

□黄亚洲

坐在京城6月的风里,尤其是坐在这么一个近两亩地的五彩缤纷的院子里,谈论一位伟人的种种事迹,且大都是与家庭生活相关联的一些事情,特别惬意。

青砖房子倒是一般的,两栋,都是二层,呈“L”形,偏是这个院子面积大,且缤纷,有树,有灌木,有草,延伸着爬上青砖墙的便是绿油油的爬山虎,爬的面积好大。

毛毛在我们没有坐下前,先兴致勃勃地介绍了这个院子。她说父亲早就说过,房子不讲究,但是院子一定要大一点的。决定给父亲修这个房子的时候,父亲还在岗位上,因为原先住的房子小,所以要修个大一点的房子搬过去。谁知刚开始修,父亲就又一次被打倒了。待到父亲第三次“复出”,这房子也刚刚修好,所以就搬进来了。

院子里原来的树只有3棵,一棵是双龙树,其实是紧挨在一起的两棵松树,另一棵是更高大一些的白皮松,再一棵是百年石榴。现在我們看到的雪松以及其他树木与花草,都是后来自家陆续陆续补种的。总之,这个大院子现在已经俨然是“大自然”的一部分了,散步于其中应该极为舒适的。据说,小平就常散步于绿树之间,当那株百年樱桃红果累累之时,小平就曾驻步树下,仰脸数樱桃,

1、2、3、4……101、102、103、104……毛毛无意中提及的这个细节令我很感兴趣:一是说明伟人也是常人,也有童心,可爱得很;二是又一次证明了小平对数字的敏感。我知道小平无论是作报告还是私下谈话,都是喜欢引用各种数字的。数字不仅是思想的体现,而且是思想的骨骼。每个务实的人都喜欢数字,数字体现精微。

小平喜欢桥牌,其实这也是一种高级的数字运算。我后来在他书房的玻璃书柜里,看到了并立摆放的三张奖状,都是桥牌协会颁发的,北京桥牌协会1995年颁给他的是一个称号:“远东杯名人桥牌赛最佳防守”;第二张是中国桥牌协会颁发的,更早,1986年,颁的是一个头衔:“兹聘请邓小平同志为为中国桥牌协会荣誉主席”;而另一张则由世界桥牌协会颁发,颁的是一句话,感谢他“为世界桥牌发展及推广之杰出贡献”。看来小平很珍视桥牌领域的这些荣誉,把它们端端正正展览在自己的书柜里,这是一个人善于理性思维的证明和荣誉。

说到这里,又想起早上出发时走的路径,觉得很有意思。我们是从毛家湾一号集合出发的,这个院子曾为林宅,我们出发前又一次特意观看了“副统帅”的办公室,那办公室里有两台黑白电视机,一台的是北京牌,一台大的是进口的,又在“副统帅”夫人的办公室里看见一台特大的地球仪,这让我一下子联想起了当年号召“世界革命”的雄心壮志,我们那些都饿得人瘦脸黑的,但红袖章上那团“解放全人类”的火焰却一直燃烧不息。后来我们瘦离了毛家湾,越野车转了两个弯后驶入地安门内大街,不多远就是米粮库胡同,然后大家下车,络绎走进了曾有伟人数樱桃的那个花草斑斓的院子。

我们的行车路线活像中国的当代史,只转了几个弯,就是迥然不同的另一境界。

要感谢伟人的精于计算,他算出了穿蓝色补丁衣服的10亿中国男女的腰包里到底有多少铜子儿,并且迎着重重阻力义无反顾地去改变这个答案,并且,谢天谢地,他也成功地改变了这个答案,让徘徊的中国大地真正实现了“莺歌燕舞”,就像他每天散步的这个仙境的院子。

而且,还不能说他只懂数字而不懂得浪漫。作为政治家,他也很懂浪漫,“一国两制”,“搁置争议、后代解决”都是想象力奇特的浪漫,鲜有政治家能提出如此新奇的思路。我在他的玻璃书柜间,还看到一件精致的圆形“玉龙”雕件,据毛毛介绍,这是海峡对岸的一位极有名度的人物特意托人带来的,由于受礼者属龙,所以这件礼物颇可解读,颇有深意,这里只能对赠礼者的身份守口如瓶。当然,如果这种神交继续向纵深发展的话,中华民族的发展前景又将突然展现出一一种令人陶醉的浪漫了。小平真是不乏浪漫的,正如他经历中的那种三落三起。

但是要指出的是,小平的所有浪漫思路都是建立在他的数字模型基础上的,他是一个务实的人,他清晰地知道自家的粮仓里有几斗米,自己的箭匣里有几根箭,他不说过头话,脚踏祖国的大地,认认真真地数樱桃,而不好好高瞻远的事。

他改变了中国。

而且是方向上的改变。

小平谢世前有囑咐,将自己的遗体提供医学解剖。据毛毛介绍,医生后来感叹说,他的心脏很健康,是40岁的心脏;这时候毛毛的二姐插话说,她当时听说的,是30岁的心脏;这时候毛毛的大姐又更正说,医生当时说的确实是40岁的心脏。我想,不管是30岁还是40岁,小平的充满朝气的思想和活力,仍是我们这个国家目前的状态写照,30岁至40岁之间,年轻、稳健、充满力量。

我的80多岁的母亲,由于“帕金森”而多年站不起来,但她听说我的一部分写作涉及邓小平,便两眼有神,每一次见我辞别,便用微弱的声音说:快去,快去,不要管我,不要讲时间,也不要讲稿费,你快动身。我好几次从北京回来,她见我便问:啥时候电视放?我说早呢,剧本还在一遍遍改呢,她的眼光每次都都会暗淡。我知道,她是怕自己坚持不到看见荧屏上的邓小平的那一天。她曾是月薪24元的民办小学教师,由于邓小平一次又一次的复出而工资大幅提升,也不用再填写“家庭出身:地主”那样的表格,最后以“五好教师”,“高级教师”的身份退休,甚至退休后还不停地涨工资,所以一提到“邓小平”三个字,她就两眼有神,尽管声音微弱。

多少善良的中国百姓,心系小平。

小平数樱桃的时候,我相信,其中必有一颗,是我母亲。

10年及至20年,甚至于更多年来,我身旁的最近处,站着两个人,一个胖子,一个瘦子。胖子是我的朋友姚鄂梅,她来得早,大概是1989年。然后这个胖子领来了一个瘦子,那是2001年的秋天。瘦子在隔年的冬天成了我的老公,老公大名余庆,可更多的人叫他毛子。姚鄂梅写小说,写小说的姚鄂梅还叫姚鄂梅;余庆写诗,写诗的余庆不叫余庆叫毛子。少壮时代两人曾在一个圈儿里混,那个圈儿叫“傻孩儿文学社”。江湖传闻,说这两人现在在更大一些圈儿里混,混得小有名气啦!我一直在那个圈圈外面满怀敬仰,偶然会朝里面张望一下,但女胖子与男瘦子都没带我进去过。

先说朋友姚鄂梅吧。我们在一起几乎有了一辈子那么长,又好像只有一天那么短。她在1989年的大冬天穿着一条麻质短裤,在宣都西正街上走得热气腾腾、怒气冲冲。眨巴眼就到了2011年的夏天,她还是走在这西正街上,手里牵着3岁的女儿,平和淡定,腰身柔软,和我讨论着父亲的病。走在她身边的我,像棵傻头傻脑的包尖白菜,硬是没看出她的学问来,年过四十倒是混出一身的都市味。20年前在她父母住的上街头那个小小的出租房里,积雪融化后的冷风从门缝里直灌进来,她多病的母亲在床上不停咳嗽,我们关上窗,熄灭灯,围着一盆小小的炭火,各自点上一支烟,努力在黑暗中做出很老到的样子。发工资的时候我们会去逛西正街,那里有很多卖衣服、口红、香水的小店,我们在桥头商场门口的地摊上点着10元的火锅,烟是没敢带上街,手里换成了啤酒,很豪迈。喝着酒,八卦身边经过的认识或不认识的人,有时她会说“傻孩儿文学社”和一个叫毛子的人。

说到书,那时我们好像没什么书可读,也没想一定要读点书。也许有几本杂志,《小说月刊》《花城》之类,更多的是我们在一起看碟,姚鄂梅在宣都中国银行的宿舍很大,客厅的中央放上席子。席子上铺着《金融时报》,专家与我们的领导在上面喋喋不休。我们两人像和尚打坐一样,坐在报纸上认真地看碟,面前是一大堆的瓜子花生,看到动情处,两人抽抽答答的,拿面纸时顺手抓一把花生或瓜子。有一次我们看到《埃及艳后》,先是和尚打坐式,看着看着,不对了,两人几乎同时转身,相向而

坐,向对方发问,“怎么回事啊!那个谁不是上一片碟就死了吗,怎么又活了啊?”我们呆了片刻,两人拔席而起,指着对方说,“我说老了吧!碟都看不懂了!”原来是我们看错了碟片的顺序。看完碟片之后,收起报纸,卷起席子,辽阔的客厅,依然干干净净,她的住处老像没住人。那一年我们都是28岁,她走了男朋友,我走了老公。

憋闷的时候姚鄂梅就想走,可不知道门在哪里,找人去算命。在冬天西正街的梧桐树下,总是坐着好几个算命的老头老太太,他们在寒风中哆哆嗦嗦为吃饱或没吃饱的人指点人生,姚鄂梅抽了“……千年的铁树要开花”一签,大喜而归。没过一千年,可能不到一千年,姚鄂梅有了走的机会,走的时候,她打点行装,把我看了又看,发现很不方便携带,很认真地说,“毛子要单了,介绍给你吧”,“最起码,他有一箱子谁都没有的书”。

相亲在一个叫伊甸园的馆子,在楼下候着,热情万分、真诚无限的是另外一个人,那个站在楼梯深处,像影子一样单薄的才是主角毛子。这个被姚鄂梅称着“诗写得好,很仗义”的哥们儿,有着一张很奇怪的脸,他的额头很高,以至于整个脸的比例还呈现出婴儿的特征,但不幸的是脸上长满皱纹,更不幸的是他皱纹间的笑,像七八岁乡野男娃子无遮无拦的笑,在皱纹间左右突围,活生生把一张脸挤得像一枚大笑着的核桃。多年后我看到“本杰明·巴顿”时,这个婴儿老人,让我想起站在我身边的这个瘦子。

事实证明,我是一个趣味古怪的人。我很好奇,好奇这样一个人的如何谈恋爱,而领袖说“要想知道梨子的滋味,就得亲口尝一尝”,我这一尝,就是10年,我越来越坚信这“梨子”是与苦瓜嫁接的。



塞尚作品

■印象

一个胖子,一个瘦子

□田兰玉

坐,向对方发问,“怎么回事啊!那个谁不是上一片碟就死了吗,怎么又活了啊?”我们呆了片刻,两人拔席而起,指着对方说,“我说老了吧!碟都看不懂了!”原来是我们看错了碟片的顺序。看完碟片之后,收起报纸,卷起席子,辽阔的客厅,依然干干净净,她的住处老像没住人。那一年我们都是28岁,她走了男朋友,我走了老公。

憋闷的时候姚鄂梅就想走,可不知道门在哪里,找人去算命。在冬天西正街的梧桐树下,总是坐着好几个算命的老头老太太,他们在寒风中哆哆嗦嗦为吃饱或没吃饱的人指点人生,姚鄂梅抽了“……千年的铁树要开花”一签,大喜而归。没过一千年,可能不到一千年,姚鄂梅有了走的机会,走的时候,她打点行装,把我看了又看,发现很不方便携带,很认真地说,“毛子要单了,介绍给你吧”,“最起码,他有一箱子谁都没有的书”。

相亲在一个叫伊甸园的馆子,在楼下候着,热情万分、真诚无限的是另外一个人,那个站在楼梯深处,像影子一样单薄的才是主角毛子。这个被姚鄂梅称着“诗写得好,很仗义”的哥们儿,有着一张很奇怪的脸,他的额头很高,以至于整个脸的比例还呈现出婴儿的特征,但不幸的是脸上长满皱纹,更不幸的是他皱纹间的笑,像七八岁乡野男娃子无遮无拦的笑,在皱纹间左右突围,活生生把一张脸挤得像一枚大笑着的核桃。多年后我看到“本杰明·巴顿”时,这个婴儿老人,让我想起站在我身边的这个瘦子。

事实证明,我是一个趣味古怪的人。我很好奇,好奇这样一个人的如何谈恋爱,而领袖说“要想知道梨子的滋味,就得亲口尝一尝”,我这一尝,就是10年,我越来越坚信这“梨子”是与苦瓜嫁接的。

“梨子”与苦瓜嫁接的这个瘦子,让我的味蕾进化成了变色龙,必须随时准备适应各种各样的古怪与荒诞。

我们的新婚之旅,从家里出发时说是去云南,到了武汉,住了一晚,我这崭新新的老公说“我们去黄山吧”。婚前,我已无数次发誓“这一次,就只当是嫁给了一条板凳!横竖要过下去”,所以我欣欣然说“去黄山,好啊!”走到安庆,他说下车吧。然后带我经过一条在乡镇还算宽敞的马路,一个看起来还蛮不错的宾馆,我很奇怪,这老公只是在四处张望,并不进去,又等了很久,我们在一个好像还没完全竣工的两层楼的房子前停下,仔细一看,房子没有门,门的地方挂着一块灰头土脸的布,布上有人用毛笔写着“旅馆”,特像80年代宜昌去武汉途中路边农家的厕所帘。我心惊胆战地问“住这儿啊?”“是啊!”刚刚以敢叫日月换新天的壮志新婚的我,差点一头栽在安庆那破房子的破布面前。一股怒火从丹田处腾地升起,脚底虎虎生风,抬脚向刚经过的那个宾馆走去,自己开房进到房间,不一会儿,有人敲门,进来后哗啦啦把行李倒在床上,收了几样他的东西,沉着愁巴巴的核桃脸,摔门而去。夕阳西下,我从窗口看着安庆这个地方,整洁安静,竟然觉得不错,换上在家不敢穿出去的T恤、短裤,晃着两条雪白的腿,以明星走在三线城市的步伐走出宾馆,在街上首先搜寻到了吃饭的地方,我端起啤酒时,想起姚鄂梅,恨得牙痒痒!

回到宾馆,酒醉饭饱,已是黄昏。躺在床上盘算着明日的行程,是回家,还是去一趟黄山。响起敲门声,拉开一看,一个农村来的很腼腆的小伙子,“大姐,你到我们这地方,怎么能住宾馆啦!去我们家住。”我这才看清他身后站着的,是那条我刚刚发誓要踢出去的“板凳”。“板凳”这时是一条喜笑颜开的“板凳”,他说:“这是海子的弟弟。”我这才记起那个“面朝大海,春暖花开”的人是安庆人。事实再次证明,我是一个趣味古怪的人。我几乎立刻就放下心中的不快,搂着“板凳”坐上了小伙子的摩托车,以朝圣者的敬重之心去看望那失去儿子的、一对可怜的老人。毛子把旅行的费用裁下三分之一送给了老人,黄山是去不了了,以致10年来老公再提与他出去旅行,终是没有唤起我挑战生理极限的决心。

我会在深夜任何时段里接到老公的“重要事项”报告。夏天,睡得正酣,电话响起,十万火急。“老婆,家里又发生大事!”“又什么事啊?”“停水。”“那找个地方去洗澡。”老公声音高八度地响起,“老婆你太狠心啦,你说这热天,我怎么睡啊?”“啊?这停水,洗了澡不是一样睡啊?”“停水,空调怎开得成,哪有水从管子里出来?”我差点在电话这头晕死过去,我没死,我想我不能死!我声情并茂地给老公讲解空调里出来的水与我们家自来水,那是好比一个住在火星上,一个住在木星上。这个时候,老公往往一脸真诚地仰望着我,仿佛是娶了百科全书。当然更多

的时候,他断言我的文化程度只可以读懂《知音》与《家庭》。为了证明自己已多少有些文化,几年前拿出练摊的勇气写了“两块小豆腐”,想在宜都界面儿先混个脸熟,让他拿去找当时在文联当主席的孔夫子兄,他去文联串门一天不去三次也有两次,可据说那天他进去步伐甚为古怪,老半天从身后拿出两张老婆的手迹,交待孔夫子:“不关关系稿啊!”

作为诗人毛子,有时也想当一个好老公,就像苦瓜也想生出梨子的味道一样。在他高兴时,特愿意把好的东西与老婆分享,当然在诗人毛子看来,大千世界好的东西就是诗。为了这好东西,我得收起庸妇的本性,多少次,我拥被坐在床头,看着老公手握书卷,比手画脚在床前晃来晃去,听他朗读那些我不认识的人,说的莫名其妙的话,慢慢地对墙面墙上好像在上演皮影戏。住住一声嘶喊“你怎么睡得像猪一样啊!”打断了我的梦,而此时我多半正梦着在捡钱。

从不想谋如何当老公,只是一厢情愿让我听诗歌的毛子不同,姚鄂梅最不喜欢我读她写的小说。2009年冬天,我一走进她在南京的家门,她老公就递过来她刚出的一本新小说,姚鄂梅不屑地一把抢过来,扔到沙发那头一个装女儿尿片的篓子里,并对老公说,“我们在一起懒得说这个,你今天睡书房啊!我和你有好多话要说。”姚鄂梅手脚麻利地把他们房间的床单全部换过,不由分说地安排他们在他们夫妻房间里休息,然后她关上门,抱着女儿进来,我们从“你老公”、“我老公”开始,直到把朋友张三儿的老公,同事李四儿的老公,隔壁王五儿好歹不嫁老公的事都说了,剖析到了,两人熬更守夜,终于揭示出了女人嫁人的秘密,那就是女人总是缺啥就嫁给了啥,就像身体差了点某种维生素,好歹要补起来才得过。三千以内的汉字我可能就能写错认错二三百,于是嫁给了认得字多一点点的毛子,姚鄂梅倒着数100估计也得结巴二三次,于是不远万里嫁给了一个北大的数学博士。我们躲在房间里研究我们的的人生成败时,她的数学博士老公正在气愤地给他妈妈打电话,报告保姆给女儿喂饭时里面竟然有一根鱼刺长达2.5厘米,要去中介投诉。我的老公正在火车站与春运大军奋战,要到南京接我回家,因为坐飞机很贵!姚鄂梅总嫌老公笨笨笨,我一直告诫老公,夹紧尾巴,几首至诗算什么?挣钱不多还是个吝啬鬼。我们最后一致认为我们这样嫁了,且过着,姚鄂梅肯定是高智商,而我一定是不差钱。怀抱这一结论,两人小休片刻,醒后来彼此好像有些脸红。走的时候,姚鄂梅给我开了一长串的书单子,说无聊时看看这些人写的书吧!她自己的作品摆满书柜,我想看,她就说“你要看点好的作品”。死丫头,一直只对我打开她的生活,不对我打开她的书,估计在书里骂了我不少。

二十年的光阴,姚鄂梅陪着这一个胖子、一个瘦子度过了,他们眼中好的东西不是诗歌就是书,没有他们,我会是什么样子呢?我一定会打麻将,然后我会隔三差五去高档美容美体馆洗洗面、搓搓背、健健身,在国贸三楼拎着几千元的衣服就走,把12公分的高跟鞋踩得如履平地……而现在,我听着诗歌,读着小说,白天过得诗情画意,一到晚上就到梦里去捡钱……夜半梦醒,恨得牙痒痒!想起胖子最讨厌别人说她胖,瘦子最自卑麻竿似的瘦,终于一吐为快,通体舒泰,经不住是哈哈大笑!

安宁河谷初冬的暖阳在我下车的一瞬,把我结结实实地拥入怀中,同时拥抱我的,还有没遮没拦、汪洋恣肆的河谷风。17年了,我第一次于冬天回故乡。不知道是我更健壮了,还是河谷两岸但凡能种树的地方都种上了经济林木的缘故,河谷风的力道好像比十几年前小了,若纤纤素指抚弄丝弦般,从冬树枝头滑过。

安宁河谷西昌段是我的故乡。随着年岁增长,我的思乡之情也在增长。故乡于我却越来越陌生,记忆中的道路和房屋不断在改变,我所认识的那些相邻乡亲,跟爷爷年纪相仿的,走得一个不利,父亲这一辈已步入老年,跟爷爷年纪相仿的都人到中年。更多的比我年纪轻的,若没有家里人指引,几乎都不认识了。

这里是我的“血地”,是我的胞衣之地。如今,我却越来越觉得自己是过客。

从巴溪口下了车,要过渡船。过了渡船才是我老家所在的村子,中坝乡大中村三组。渡口还是那渡口,几百年来艄公换了一茬又一茬。刚下渡船,遇到刘洪禄老两口。几十年前,当我爷爷奶奶还是四类分子时,他们的阿爸阿妈也是四类分子。同样的遭遇,让我们两家从那时候就走得比较近。夫妇俩都80多岁了,身板还是那么硬朗,耳聪目明。见了我,很热情地跟我打招呼,邀我去他们家喝茶,并拉过身边一个七八岁的小男孩,教他喊我“阿公”。阿公就是爷爷。

几个月前,当我们几弟兄提出要给父亲过生的时候,父亲在电话里对我说,刘洪禄两口子80多了,除了一个傻女,子女个个都殷富,却从来不过生——把岁数忘了,越活越年轻。父亲说,不过生,一图省事,二图吉利。他说某家过了70岁生日,没多久就走了。他说:“你不放炮,阎王爷想不起翻生簿,你这炮仗一放,惊动了他老人家,一翻簿子,都

超过好多年了,提起朱笔,大笔一挥……”跟讲故事一样,说得有鼻子有眼的。

我家兄弟四个,其中3个大学毕业,我最大。为了交我们读书的学费,父母曾连续6年没有缝过新衣服。我本该退学回来替他分担一些重担,但父母不让,大学毕业,我又到了离他8000多里的江尾海头启东市,父母的辛劳更是一点都分担不到。我是最惭愧的。古人云,亲在不远游。我不仅远游了,还在远游之地定居下来。尊重父亲不过生日的意见,我决定利用公休假期他身边陪他住几宿。我都打算好了,给父母从里到外买两套新衣服,特别要给父亲买两套红色的内衣裤。没有别的意思,惟愿他们健康长寿。

刘洪禄辈分问我:“表弟,小舅爷的脚好没有?”他说的小舅爷就是我爹,不晓得是从哪里论起来的。

我一下愣了,之前在电话里从来没有听父母说过,感觉非常突然。我无比惭愧,外人都晓得的事,作为长子的我,竟然一点都不知道。我本来想装作知道,含混回答他一下,又怕搞不好露了馅儿,就老老实实说,这事之前我父亲从来没跟我提过。刘洪禄说:“你爹你妈不容易,好事拿出来跟儿女分享,坏事从来不让你们担忧。”这些年来,父母知道我离他们太远,怕我担心,干着急,家里发生好多事情,比如前几年弟弟婚姻变故、母亲的腿被别人的狗咬伤,都是事情结束后,才从旁人那里听说的。

回到父母身边才知道,父亲脚上的伤是春天落下的。在他砍柴火的时候,一根柴火碎末飞起来刺进他卷起裤脚的左脚外侧,当时拔掉刺,抓了点泥巴盖上去止住血,就没当回事。农村里的人,这种小伤是经常遇到的。一般都任其慢慢收口、长好。这一次例外,从春天到夏天又到秋天,挖洋葱、麦收、插秧、收稻

伤疤

□李新勇

谷,一件连着一件。老家那六七亩地,主力是最小的弟弟和弟媳妇,人手不够,父亲常亲自下田经营,年年如此。伤口被反复感染,不断扩大。到水稻收上来时,伤口不仅不见好,溃烂的地方不断扩大,感染的地方有如一个瘤子,鼓胀着,里面全是脓。到这时候,我爹才觉得这是个事儿了。留在身边的两个弟弟和弟媳妇劝他上医院,从家里进城要两个小时,到了医院排队又等了三个小时,终于轮到 he 坐到医生面前的小凳上,那医生从检查到开完处方,总共用时不到三分钟。开了几百块钱的药,涂擦上去,不仅不见效果,反而红肿得更厉害。刘洪禄听了,专程上我家来对我父亲说,十几里外的阿七乡一个土医生有治疗刀伤的本事,建议去找他看看。土医生用土办法,拿手术刀把化脓的伤口切开,然后用一个勺子状的工具,替父亲刮取脓液,一直刮到肉上。血肉模糊,不用麻醉。好几次把我父亲痛昏过去。先后去治疗过三次,创口只见增大,不见减小,腿部还开始产生麻木感。单听父亲简单的描述,我都心惊肉跳。

我准备带父亲到城里的医院,他还是嫌麻烦,说活了这么一把年纪,小创小伤从来没上医院的,说出去给人笑话。我仔细查看了城里大医院给他开的药,从痔疮到疔疮,什么疮毒

都能治,就是于父亲的化脓性外伤伤口不适合。好歹我曾经学过一阵中医,我分析,父亲得服解毒平血的中药和抗病毒的西药,外擦的必须是去腐生肌的膏药,要将父亲自身的造肌功能调理起来,让创口逐步缩小。我进城花了大半天工夫跑了好几家药店,买回想要的药来,内服加外擦,两天工夫就见效,红肿消退了,麻木的感觉也消失了。十几天的公休假结束,到我离开故乡的时候,创口缩小到两颗黄豆那么大了。

活在这样的世界,可以不懂文学,不懂数理逻辑,不懂天文地理,但不必须懂一点医学。不为济世,只为能从无良庸医的屠刀下侥幸逃脱。

父亲70岁生日这天,安宁河谷的风依旧那么轻柔,风中夹杂着冬豌豆和荞麦花的香味。高原上的太阳依旧在不紧不慢的节奏中,暖烘烘地烤着高原河谷。上午父母亲一起在菜园里给一畦青菜拔草。再过多天,这茬青菜就能上市了。我负责做饭。炖了一只自家养的鸡,炒了一盘回锅肉,还有几样从菜园子里挑回来的小菜,就算父亲的生日宴了。

饭后我送红包给父亲,父亲把红包壳子收了,把钱还给我。他说:“你该到你的初中母校去看看。说不定再过几年,这个学校就没有了。这些钱你拿去给那个学校的娃娃买几本书。”

第二天我就去了。母校还在那位置,但已经不是我记忆中的母校了。从前呈“国”字形排列的土坯房子全都拆掉了,取而代之的是几幢两层高的楼房。因初中学生一年比一年少的缘故,乡里把乡中心小学搬过来跟初中合并,统称九年制义务教育。初一只招到8个学生,任课教师比学生还多两个。本乡其他学生都到城里或者一河之隔的其他乡镇中学就读了。

我打电话到曾出过我两本书的出版社,拼

拼凑凑,买了近300本书,在我回到江苏启东之后寄了过去。我不晓得,当这所学校的孩子拿到这些书的时候会怎样想,他们会不会想到,30年前,我跟他们一样,就在这所学校挑灯夜读?会不会喜欢这些书?会不会嫌弃这些书放在书包里成了他的累赘?

既然送出去,我就不管这么多了。这些孩子的父母亲,不少是我的校友,甚至是同窗。我想起在这所学校读书的时候,得了一本竖版繁体字的《水浒传》,翻过来调过去看了好多遍。我爹为我订了份《四川农村报》,每周有一版叫“蒲公英”的文学副刊,成了我们全班争相传看的报纸。这个版面成了我文学的导师,我的第一篇文章就刊发在这份报纸上。初三那年,老师跟校长闹矛盾,任课教师动不动就罢课,我们经常被放羊。上课时间,教室里人烟凋敝。没老师来上课,也无作业可做。我不知从哪里搞到一本《七剑下天山》,没白没黑地读。有一天,被卖菜归来的父亲从教室的窗户看见了,他悄悄站在教室外面,直到下课铃声响起,才跨进人烟更加凋敝的教室,掀开那本书的封面看了一眼,不愠不火地问我:“下课了为啥不休息?”我又惊又惭愧。父亲没有多说一句,出了教室门,把一副卖完菜的空担子搁到肩上,晃晃荡荡地走出校园。也许就是从那一天开始,我向往成为一名作家,写一些作品出来,能够给向暗无助的心灵,照进一缕阳光。

我父母的年纪一天天变大,而我的母校苍老的速度似乎比人苍老的速度还要快。母校尚存的旧迹,是校园主干道边那几棵细叶桉树,那是一种不断生长、不断脱皮的树,长得比从前粗壮高大,在没有多少内容的校园,显得那样高大突兀,旁若无人,有一些孤单,也有一些寂寞。这学校哪天恐怕真的说没就没有了。